

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

李建欣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審

誠如黃心川先生所言：「巨贊法師是改革浪潮的浪尖兒太虛路線的繼承者，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為了佛教的復興和改革，殫精竭慮，勇猛直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奉獻了一生。」、「巨贊法師是一位解行相應的佛教改革家，他把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了佛教的改革和復興事業。」

一、追求佛教改革的一生

據法師自述，19歲那年他到杭州靈隱寺想出家，剛巧太虛法師在那裡，要他做一篇出家志願書。當中有一個志願是「改革佛教」。太虛法師對其文很賞識，有「斯亦有志於道之士，得其師導，可臻上達」的評語。可見，自青年時代起，巨贊法師就早已立下改革佛教的宏願。

1932年，在杭州經太虛法師介紹，依靈隱寺卻非和尚正式出家，受具足戒於寶華山。

之後，先後在歐陽竟無的內學院和四川漢藏教理院學習、教書。抗戰中，1939年先在湖南南嶽辦佛學研究社，組織佛教青年服務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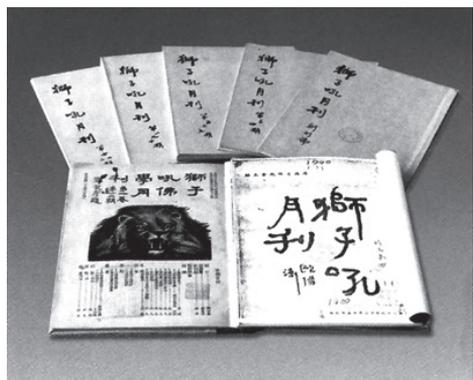
青年時期的巨贊法師

1940 年秋，到廣西桂林辦《獅子吼月刊》。

「《獅子吼月刊》，1940 年 12 月 15 日出版。……據該刊《代發刊詞》云：『該刊的主要內容是著重用歷史眼光，對全部教理，作有系統的整理，順應時代潮流，重新建立一套新佛教的理論。同時，更針對敵偽的荒謬宣傳，儘量發揮佛教的反侵略的思想，從佛教崗位上，來鞏固抗日民族戰線，支持長期抗戰。所以，其基本任務就是，用歷史的眼光整理佛學，使佛學通俗化、現代化，而能適應現代思潮，樹立新佛教運動的文化堡壘。宣揚佛教的反侵略思想，促進佛教同仁為抗戰救國服務。報導國內外佛教動態，以佛學觀點來評價現代一切學術思潮。』……該刊自創辦以後，一直在新佛教運動方面頗有建樹，除了宣傳新佛教運動之外，還專門出版了『新佛教運動專刊』，在當時佛教界獨樹一幟，影響很大。」

反映巨贊法師關於佛教改革基本思想的篇章〈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新佛教運動與抗戰救國〉等，都是在《獅子吼月刊》的前幾期集中刊出的。這份期刊實際只出 6 期，即 1940 年第 1 卷第 1、2 期，1941 年第 1 卷第 3、4 期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5、6、7 期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8、9、10 期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11、12 期合刊。短命的期刊卻給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文獻。

「這一時期由於法師和各界頻繁接觸，得能深入考察社會各個階層的底蘊，從而堅定



巨贊法師與道安法師共同創辦並主編的《獅子吼月刊》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三期

了他徹底改革佛教的夙願，提出了『生產化』、『學術化』兩個口號，撰成了約二十萬字的《新佛教概論》。……《新佛教概論》的基本內容是：認為過去的佛教和封建主義血肉相連，佛教徒的思想行為受它的影響很大，不少是迷信的、落後的，因此要排除佛教中封建迷信的毒素，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必須用科學的歷史觀點，在理論方面研究大乘教理，才能棄偽揚真，澄清思想；在行為方面，要發揚菩薩的積極精神，無我除執，以之實踐理論；對於僧伽制度、僧伽教育的改革，僧伽人才的培養，寺廟的管理和整頓，經典、文物的保管和整理，佛教界的因循守舊的積弊如何革除等等，在這本書裡都有詳盡系統的闡述。對於廣建壇場，聚眾諷誦，以做佛事為衣食之資，巨法師尤為反對，他一向力主佛教徒要要參加勞動，自食其力，發揚古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美德，恢復釋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陀的優良傳統。只有這樣才能不被淘汰，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才有自己安身立命之處，也才能體現「生產化、學術化」的宗旨。」

在桂林期間，巨贊法師曾想把廣西省佛教會作為新佛教運動的一個據點，「目前最要緊的，是找一個新佛教運動的據點。有了據點，才能集中人材，分工合作。……由於他本身的沒有阻力，黨政界的開明，加上文化界的熱情，我們想在這裡建立新佛教運動的根據地。……同時想應用生產化、學術化的原則，組織一個實驗叢林，全國為佛教界之倡」。後來不知何故沒有結果。1942年巨贊法師離開桂林，來到桂平西山，任龍華寺主持，頗想有所作為：

我倒很想把西山做個實驗的場所，最近已經成立了佛教會，會址設於龍華寺，會員約有二百餘人；李公祠和水月宮本

來是潯地男女佛教徒禮拜之所，亦已改為居士林，附設五明圖書館。……每月下山兩次，為女居士們所舉辦的女子佛學研究班授課。假定經濟可能充裕的話，還得辦刊物，和編印比較通俗的佛學書籍。這是關於學術化方面的。「生產化」方面，從培植西山茶著手，已經開了十多畝田地，種了百多年種子，大約三四年後，每年或者可以採到幾百斤茶葉。……那我們的生活，真可以連田租都不靠。

法師還有關於風景建設方面的具體設想。可惜的是，法師在這裡的佛教改革事業剛剛開了個頭，就由於國民黨頑固分子的誣陷與阻撓而中斷。

1946年巨贊法師回到杭州。那時的浙江省主席沈鴻烈曾經鼓勵他草擬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務的計畫。後來其繼任者陳儀與省民政廳廳長杜偉居士，兩次希望他能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務，但法師認為「社會經濟基礎未變，舊有的一切，結合在一起，牢固不化，以民政廳長的全副力量，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觀的願望，唯心的想法，決不會成功的」。

1948年巨贊法師在香港講經，遇到了李濟深、沈均儒、章伯均、郭沫若諸先生。大家都認為佛教問題是一個大問題。人民解放軍不久解放全中國，佛教的現狀必將打破，以後如何



巨贊法師在香港留影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三期

做法呢？巨贊法師鑑於此，就到台灣去考察，想看看日本化的佛教究竟如何。巨贊法師在台灣參訪一個多月，撰寫了《臺灣行腳記》，其最後結論是：「臺灣佛教正面臨著必須向『中道』轉變的關頭，誰能不忘根本，而又能順應潮流，即足以領導臺灣未來的佛教，也將被全臺灣的三百萬佛教徒所擁護，而協助政府奠定長治久安的基礎。日月潭的湛澄，草山的雅靜，將會鐘毓一兩位出類拔萃的大德，打開臺灣佛教的局面。噫！非斯人，吾誰與歸？」

考慮到巨贊法師到台灣考察佛教的背景——為新中國佛教改革草擬計畫，我們在這裡似乎聽到了他的弦外之音，即：只有抓住佛教的根本，同時又能順應潮流者，才能領導新中國未來的佛教，並被佛教徒所擁護；解放前夕的大陸何嘗不是在期待著「一兩位出類拔萃的大德」，來打開新中國佛教的局面？如法師所說：「改革中國佛教教務，應配合朝代，重訂合理的辦法，日本化只能供參考而已。」

巨贊法師由台灣回到杭州，開始考慮草擬改革全國佛教教務的計畫，趙樸初居士也為此到杭州與法師商量過一次，想祕密召集分散在滬、杭、甬一帶的進步的佛教徒開一個會，切實商決具體辦法，但因故未成。淮海戰役一結束，法師由杭州至香港。時任中共華南局負責人的潘漢年通過別人，要巨贊法師寫一個新中國佛教改革草案，後此草案由潘漢年讓人帶到當時為中央所在地的石家莊。

1949年4月13日巨贊法師由香港抵達北京。在北京經過一個多月的考察與討論，以北京市佛教同人的名義，為改革全國佛教，上書毛主席及各民主黨派。其內容被概括為四點，有關佛教改革的部分就占三點：

二、……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全國各大小寺院，由封建地主而商店化、家庭化，格外加強了迷信與沒落傾向，使佛教受盡了社會的揶揄與輕褻。我們實在覺得非常痛心，也曾經做過一點改進工作。但佛教這一個階層，和整個社會是分不開的，整個社會沒有改革，佛教內部的革新也無法進行。所以佛教革新的運動，雖然也有三十年的過程，而在這個時代以前，可以說是毫無成績。……

三、佛教的本質不同於別的宗教，他「無神」又主張「實踐無我」，與時代精神深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臺灣，都是崇奉佛教的。和我們毗連著的國家，如安南、暹羅、緬甸、錫蘭、印度、朝鮮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國家。假定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漠視了佛教這一個單位，恐怕對於解放西藏、臺灣和世界革命的進展，或者會發生困難的。反之，如果新中國的國土上，出現了佛教的新姿態，對於全國的完全解放和世界革命的進展，或者也不無便利之處。

四、提出「生產化」、「學術化」兩個口號，作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標。生產化可以打破舊時各寺院封建的經濟組織，學術化則加強佛教徒對於佛教的認識與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組織與迷信的愚昧既已毀棄，佛教革命的本質，才能完全流露。

人民政協籌備開會之前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頒布了嚴禁毀壞寺廟古跡文物的通告。巨贊法師認為消極的保護之後應該有積極的整理，才能收到實效。他曾經本著這個意見，與時任北京市副市長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三期

的張友漁談過一次。張友漁說，積極整理對於佛教和政府都有益處，但非有一個佛教團體從中領導不可；組織團體的時候，最好以解決佛教問題為宗旨，不必涉及其他。法師根據這個意見，草擬了一個中華全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和籌備會的章程，送請統一戰線部核奪。統戰部的同志說目前這樣做恐怕是有困難的。

巨贊法師領導佛教界開展佛教改革的工作，具體說來，是在北京正式成立北京市佛教徒學習會，開辦僧尼學習班。組織僧尼學習班的目的：「一、學習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二、實行佛教『濟世無我』的積極精神，建立勞動觀點，服務人民。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949年9月在北京召開，巨贊法師（前排左二）為唯一僧人代表。

三、肅清封建迷信的思想，爭取佛教的光明，輔助社會進化，完成人間樂土。」僧尼通過學習「認識了時代，認識了佛教的真精神，接受得了改革佛教教務的理論與辦法」；「我們開辦麻袋工廠，把他們吸收在這一個生產部門裡去，配合著『新叢林』的計劃，開展中國佛教新建設的第一步」；開辦大雄麻袋工廠，「把北京市僧尼勞動生產的問題整個解決」。巨贊法師還制訂了《新叢林組織綱要》（草案）。

1949年5月29日，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召開關於各宗教教務改革的第三次座談會，討論由巨贊法師所提出的三個文件：一、目前佛教的情形，二、關於處理一般宗教問題的意見，三、改造佛教的意見。後來巨贊法師吸取了大家的意見，從頭加以修改，

成為《改革佛教的意見》。其基本原則有四條，其中，「二、從勞動生產徹底改革佛教的現行制度，使出家僧尼，老者有所養，少者有工作，消滅寺院的地主資格，子孫私有制度，和迷信營業。三、依據人民政府《共同綱領》第四十條之指示，用科學的歷史觀點，在理論方面，研究大乘教理，棄偽揚真以澄清思想；在行為方面，發揚菩薩行的積極精神，無我除執以實踐理論；在文物方面，保全資料，芟蕪去穢以整理典籍」，其核心實質不外乎生產化與學術化兩大目標。

1949年6月18日，李濟深、陳銘樞、唐生智、趙樸初、方子藩、周叔迦與巨贊七人，邀請出席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代表當中與佛教有關的諸先生在森隆飯莊座談。討論結果，為避免誤會起見，《改革佛教意見書》改題名為《中國佛教教務改革意見書》，徵求全國僧尼的意見。與之同時，發起組織現代佛學社，出版《現代佛學》月刊，巨贊法師為主編。

1952年，巨贊法師與李濟深、葉恭綽、陳銘樞、趙樸初等籌建中國佛教協會，任籌備處副主任；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時當選為副祕書長；1957年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屆副會長兼副祕書長；文革初期以現行反革命的莫須有罪名，被關進監獄達七年之久，1980年平反。1984年齋志而歿。

二、巨贊法師的佛教改革思想

如上所述，巨贊法師十九歲那年在杭州靈隱寺巧遇太虛法師，想從他出家；太虛法師讓他做一篇出家志願書。巨贊法師用駢文寫了四個志願，其中一個志願即是「改革佛教」。太虛法師評語中有「斯亦有志於道之士，得其師導，可臻上達」。可見，巨贊法師從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三期

青年時代就確立了改革中國佛教的宏願。

法師為什麼一定要改革佛教？其初衷何在？應是出於對佛教現狀的不滿。由於巨贊法師是佛教中人，因此對於長期以來佛教的積弊看得十分清楚，這是教外人士所不能比擬的。如黃心川先生所分析：「我國過去的佛教和封建主義血肉相連，佛教徒的思想和行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封建主義的影響，表現出十分迷信落後。」

巨贊法師在不同時期的文章裡，對佛教的現狀進行過沉痛的描述：「寺廟生活情形，反一天一天違背唐代的合理性，以至於構成現在叢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廟家庭化的畸形狀態。所謂最精密的理論，自宋以來，就逐漸被



巨贊法師（前排左三）與趙樸初居士（前排左一）接待外國訪客。

那些多閑的長老們菲薄著，目為義學空談。大部分和尚，本來是為著生活出家，更用不著佛理。整個佛教界浮沉在愚河癡海的無知淘浪之中，跟著來的就是迷信的『慈航』。佛非但需要批發他所毀棄過的祀神儀式和咒語，同時還得披上方士式的八卦道袍。」法師指出了佛教中存在「叢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廟家庭化的畸形狀態」，義學衰落和迷信色彩濃厚。

法師還分析道：「大概是僧伽分子太雜，一般知識水準過於低的關係，『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自然和上層社會不能取得聯繫，

永遠得不到見識。又因為生活的驅使，逼得他們不得不趨於頑劣，做盡許多佛法所不容許的事情，嫉妒障礙，分黨分派，固然也含有爭奪飯碗的因素，一方面則因為和尚們大都氣量狹小，不顧大局。」又說：「佛教界內高僧大德固然很多，而大部分有知識的，成日價談玄說妙，行為上則連起碼的同情心都沒有。爭名奪利，排擠傾軋，和市僧一般無二。沒有知識的，為著找飯吃，東奔西走，不能不墮落到社會的最下層；甚麼禮義廉恥，甚麼六度四攝，他們是沒有辦法做得到的。」

這裡，巨贊法師又就僧伽的成分進行具體分析：有知識的僧人「談玄說妙」、「爭名奪利，排擠傾軋」；「氣量狹小，不顧大局」；沒有知識的僧人為生活所迫，「做盡許多佛法所不容許的事情」。

新中國甫建立，巨贊法師就對佛教界的痼疾進行了深入的概括：

我以為流行在佛教界的歪風，不外四種：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二、抱殘守缺，膠柱鼓瑟；三、買空賣空，言不及義；四、假貌為善，蛀蝕佛教。這也免不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八股，自然也都是機會主義。機會主義者，投機取巧，只願為個人打算之謂也。為個人打算得愈周到，距佛教的精神愈遙遠，這在出家人方面表現得最使人傷心，因此社會上有家認為那就是佛教，連帶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也受到了糟蹋。……過去佛教界的情形如此，欲求佛教之不為社會所非難攻擊，真是不可能的事。

這是法師經過十幾年的佛教改革實踐與理論思考後，對佛教界所存在弊端的準確診斷。很難說這些弊端在當代中國佛教界已經絕跡了，因此對於當前的佛教界無疑還具有十分重要的警戒意義。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三期

巨贊法師正是基於對佛教中所存在問題的深刻認識，他才痛感改革中國佛教的必要，並且提出了一套比較成系統的改革方略。巨贊法師的佛教改革思想，集中出現在桂林時期他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中。巨贊法師於1940年秋到桂林，《巨贊法師全集》主編朱哲在〈當代名僧巨贊法師傳略——僅以此文紀念巨贊法師逝世十三週年〉一文中說：

這一時期由於法師和各界頻繁接觸，得能深入考察社會各個階層的底蘊，從而堅定了他徹底改革佛教的夙願，提出了「生產化」、「學術化」兩個口號，撰成了約二十萬餘字的《新佛教概論》。……《新佛教概論》的基本內容是：認為過去的佛教和封建主義血肉相連，有密切的關係，佛教徒的思想行為受它的影響很大，不少是迷信的、落後的，因此，要排除佛教中封建迷信的毒素，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必須用科學的歷史觀點，在理論方面研究大乘教理，才能棄偽揚真，澄清思想；在行為方面，要發揚菩薩的積極精神，無我除執，以之實踐理論。對於僧伽制度、僧伽教育的改革、僧伽人才的培養，寺廟的管理和整頓，經典、文物的保管和整理，佛教界因循守舊的積弊如何革除等等，在這本書裡都有詳盡的闡述。對於廣建壇場、聚眾諷誦，以做佛事為衣食之資，巨法師尤為反對，他一向力主佛教徒要參加勞動生產，自食其力，發揚古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美德，恢復釋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陀的優良傳統。只有這樣才能不被淘汰，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才有自己安身立命之處，也才能體現「生產化」和「學術化」的宗旨。

但朱哲也感嘆：「可惜的是，巨贊法師革新佛教的代表作——二十多萬字的《新佛教概論》至今仍是石沉大海，沒有下落。」然而，讓我們感到慶幸的是，巨贊法師於1940-1941年在他所主編的《獅子吼月刊》上，集中發表了數篇有關佛教改革的文章，〈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2期）、〈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8、9、10期合刊）、〈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新佛教運動與抗戰救國〉（《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我們大膽地推測：這些文章很可能就是佚失的《新佛教概論》的主要章節。



巨贊法師全集

巨贊法師關於佛教改革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

現在要討論到如何完成新佛教運動了。第一：新佛教運動要和全面抗戰、全民動員的陣容配合著，普遍發動佛教同仁參加實際工作，這對於國家、民族貢獻之大，上面已經說過，不必再提。……

第二，整理僧制。目前的僧制，非但違反唐代的辦法，亦且非佛所許可。其招致全社會的非難，真是理所當然。……我以為整理僧制，應該確定兩個目標：一、生產化；二、學術化。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二十三期

生產化是僧徒各盡其能，生活自給。絕對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債和買賣式的迷信營業。效法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是最妥當的辦法。這樣，做和尚的並不是一種職業，而也能參加勞動生產。對於社會經濟，關係最大，增加一般僧徒的健康，猶其餘事。寫到此地，我覺得一般僧徒之幾于完全無知無識，原因是在懶；懶則由於身體之不健康，吃現成飯有以致之。生產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懶的魔鬼從佛教界裡驅逐出去，則一切才有辦法。

學術化則恢復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個廟都造成學術團體，而每一個和尚都是文化人。玄奘法師在印度學法的那爛陀寺，六朝慧遠法師所組織的東林寺，都是這種辦法。……跟著第一個目標來的工作是全國廟產的統制，跟著第二個目標的工作是全國僧尼的沙汰。……

第三、整理教理。關於教理的整理，有許多人想做、在做，大都是考證方面的。我覺得至目前為止，佛教界內各種著作，都還沒有和當前的問題銜接。也就是說，沒有能夠用純正的佛理，明確地、簡單地，替人類解答科學上、哲學上，以及社會政治上的許多問題。這就需要新佛教運動者，在「體驗佛理」、服務人群之外，對於世界上的一切學問，都要有深切的瞭解才行。……

至於全部藏經的整理，內學院現正籌雕精刻全藏，其成就當在大正新修《大藏經》之上，希望各界幫助他。此外如西藏、錫蘭、暹羅、緬甸等處佛教的研究與翻譯，印度佛教史跡的調查，也有人在孜孜從事。而佛教內各個問題的

窮源競流，如：戒律的系統研究，小乘各部本末義的研究，大乘各宗義理與史實的研究，中國佛教史研究，都還沒有可以大書特書的成績。

除了第一點是有關時局的之外，第二整理僧伽，第三整理教理為巨贊法師改革佛教的兩個重要方面。而法師為整理僧伽確定兩個目標：一是生產化，二是學術化。「生產化，學術化，就是使僧制不至於俗化，而僧人的生活可因而莊嚴起來。詳細條文，當然先要把諸家戒本徹底對比研究一番，再參考古代的清規和當前的環境方能定。」巨贊法師後來自己又進一步概括為：「提出『生產化』、『學術化』兩個口號，作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標。生產化可以打破舊時各寺院封建的經濟組織，學術化則加強佛教徒對於佛教的認識與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組織與迷信的愚昧既已毀棄，佛教革命的本質，才能完全流露。」

「生產化是僧徒各盡其能，生活自給。絕對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債和買賣式的迷信營業。效法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生產化』則求生活之自足自給，根本剷除替人家念經拜懺化緣求乞之陋習，如此則佛教本身可以健全，然後才能談得上對國家社會的貢獻。」「生產化」是為了解決僧徒的生存問題，自給自足，不再仰仗收租放債、替



巨贊法師故居贊園裡的雕像

人家念經、拜懺、化緣、求乞而生活，這樣才可以提升僧人的社會形象，莊嚴僧人的生產。

巨贊法師對於「生產化」還有比較具體的設想，「就寺廟附近的山或地開闢農林場，勿使有一寸土荒廢，其餘的租穀，除掉夠僧眾們吃用的以外，統統匯合起來舉辦大規模的慈善事業和佛教事業，什麼佛教工廠，佛教醫院，佛教教養院，佛教大學，佛教……都可以建立得起，儘量的把全國僧尼各盡所能地吸納進去，教他們，使他們個個成為生產者或學者，這才算是佛教改革的初步的成功」。1942年，巨贊法師在桂平西山任龍華寺主持時，有機會把自己「生產化」的設想付諸實踐，可惜剛開了個頭就夭折了。建國後，巨贊法師組織建立大雄麻袋廠等都是有關「生產化」的具體實踐。

「學術化則恢復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個廟都造成學術團體，而每一個和尚都是文化人。」「『學術化』在於提高僧眾的知識水準，博學慎思，研入世出世間一切學問，恢復僧眾在學術界原有的地位。」法師在談及「學術化」時是以印度的那爛陀寺為原型的：

尼赫魯說：「……。它是專門注重高深的研究工作的，中國、日本，甚至據說朝鮮、蒙古和布魯都有學生被吸引到這裡來求學。除了宗教和哲學科目（佛教、婆羅門教都有）外，非宗教性的和實用的科目亦予傳授。大學內有一個藝術學院、一個建築系、一個醫學院、一個農業系；還有牛奶場和家畜場。大學裡的文化生產據說都是些生動的辯論和討論。印度文化的傳佈到國外，大部就是那爛陀大學裡出來的學者們所做的事業。」這說明那爛陀寺的教學精神，除以辯論和討論的方式研究佛教哲理外，還學習非宗教性科目，其中包括生產事業，此外還注重國際間的友好往來。

巨贊法師以印度那爛陀寺為例外，說明寺院曾是中世紀學問的中心，曾對印度文化做出過巨大的貢獻。提倡「學術化」的目的在於「恢復僧眾在學術界原有的地位」。

在巨贊法師改革佛教的設想中，整理教理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整理教理就是「能夠用純正的佛理，明確地、簡單地，替人類解答科學上、哲學上，以及社會政治上的許多問題」。實質上也就是佛教「理論的現代化、通俗化的開展」，而「理論的現代化、通俗化的開展，則無論如何要從佛教最基本的中心出發，否則現代化即等於密教之同化於印度教，通俗化即庸俗化而已。新佛教運動如能依照這個目標做下去，才是道地的隨機說法，真正的新的適應，在佛教界內固然可以發生模範的作用，同時也就是揭示客觀的真理於人間，其效能不僅僅是關於佛教本身的改進而已」。

佛教的中心所在是什麼？巨贊法師認為：

無論是印度的、中國的佛教思想，都以「龍樹無著學」為中心，做根本；無論是三論、天臺、法相、賢首，乃至禪與密、淨，都從「龍樹無著學」流出。那末我們——新佛教運動者，為救弊扶弱起見，對於龍樹無著學應該先有透徹的瞭解，至少要有相當的根底。否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結果不是「以水投水」，就是離經叛道。離經叛道之有害於佛，人所共知，「以水投水」，依然漂蕩在「門戶」的末流裡，決不能剝落佛門之瘡，顯示新鮮活潑的精神而恢復哲學的本態，對於佛教，無外乎也只有加深苦難。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巨贊法師關於改革中國的設想，是以對佛教教理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為基礎的，首先要確立佛教的中心，然後才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二十三期

可能超越門戶之見，「剝落佛門之瘡，顯示新鮮活潑的精神而恢復哲學的本態」。而法師以為無論印度或中國的佛教思想都是以「龍樹無著學」為中心。法師認為：

佛所說法本無所謂大乘小乘，其判分在佛滅度以後，大約公元前一世紀，印度的佛教界已經分裂成二十部左右（有南傳北傳兩說），爭執著許多零零碎碎的問題，循至於失掉佛的本意，後來的人乃稱之曰小乘，又經過一兩百年而有龍樹出世。他是佛滅度後，最有手眼的菩薩，看到當時佛教界的龐雜無緒，用秋風掃落葉的手段建立所謂「空宗」（法性宗），佛的真精神才又能顯示於世，這就是大乘。其後不久，佛教界有許多人誤解了他的理論，同時社會環境又須要佛弟子們對教理作一番新穎的解釋，於是有無著世親的「有宗」（法相宗）出現。有宗討論每一個問題起來，都用比勘的方法，所以是印度佛教的集大成，而其「微言要旨」，又和空宗不相違。佛教經過這兩個宗派的開發，才能放射其千古常新的光芒，奠定了不可動搖的中心思想。



浙江天台國清寺巨贊法師塔

巨贊法師進而認為：「無著、世親之說有，初未異於龍樹、提婆之談空，環境不同，各有詳略，未容紛爭長短於其間者也。」、「唯

識和中觀二家雖然是對立的，但它們仍然有共同點，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共同點還不算小。」

在改革中國佛教先後側重方面，法師認為：「先把佛教的現行制度改革好，然後再整理思想。」、「制度改革好了，僧徒不能再用信仰謀生活，而要從生活中實踐信仰、表現信仰。」

在整理思想方面，巨贊法師提出兩點：

（一）歷史發展的觀點；（二）從行為中踐履的精神。過去佛教界因為有許多紛爭，所以削弱了佛教的力量，而紛爭之起，我以為是起於不知道歷史發展的觀點。……又過去大家不注重從行為中履踐的精神，縱使談空說有、舌底生蓮，或者勇猛精進、守身如玉，結果還只是他個人的事，或者竟是「脫空妄語漢」，這就違背了釋迦牟尼平實的、和人民大眾緊緊地團結在一起的精神了。

總之，巨贊法師的佛教改革思想，是法師從事佛教改革事業和對佛教思想進行精研與深入思考的結晶，是現代中國難得的佛教改革方略之一，對當代中國的佛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它是法師留下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法師關於改革中國佛教的一些設想，已經或正在被後人所繼承並貫穿到當代佛教的具體改革實踐之中，巨贊法師的現實主義和與時俱進的精神，對中國的未來佛教改革事業必將產生有益的影響。

